

## ■ 沧桑齐鲁

据《郯城县志》记载，孔子曾到郯东部的马陵山上登高望海，后人称此地为“望海楼”。孔子“问官”之后，曾感慨道：

“吾闻之，‘天子失官，学在四夷’，犹信。”孔子将鲁文化的种子传播至此，对齐鲁大地的文化融合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。

## 孔夫子踏足沂蒙

□ 本报记者 卢昱  
本报通讯员 颜超 臧德三

尼山位于曲阜、邹城、泗水三地交界处，海拔不过340余米，山顶五峰连峙，后人为避孔子讳，将尼丘改称为尼山。

在孔子出生前，尼山还叫“尼丘”。当时住在山脚附近的孔子父母“祷于尼丘”，或许是感动了尼山的“土地神”，不久就有了孔子，两人干脆给孔子起名丘、字仲尼。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没有孔子，尼山不必改名，可若是真没有孔子，尼山也断然不会有如今的名气。

从孔子父母专程上山祷告求子的举动可以看出，孔子承载着父母太多的期待。这种来自家庭、来自家族的天生责任感伴随着孔子一生，对他价值观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。而尼山以东的东夷土地，今天的沂蒙山区，也有诸多孔子的足迹。如今，这些山水形势未变，讲述着远古的传说。

## 父亲叔梁纥在此征战

孔子的先祖脉络清晰，可追溯到商朝王室的微子启。微子启为商纣王之兄，因不满暴政，投奔周，封为宋国国君。

孔子的祖先第一个姓“孔”的是孔父嘉，以大司马身份辅佐宋穆公和宋殇公达19年，以“贤”著称。公元前710年，孔父嘉被政敌大宰华父督发动政变所杀，孔氏卿大夫的世袭之位被废除，其子木金父被降为士。家族从此走上没落之途，孔父嘉的曾孙孔防叔“为避宋乱”，而迁居鲁国，并被封为大夫。

孔子父亲叔梁纥虽只是贵族身份武士，却以勇敢著称，他最伟大的壮举就是冒死固守防邑（今临沂兰山境内防城故城）。公元前556年，强大的齐国侵入鲁国的北部，齐军高厚带领部队围困了鲁国的防邑。

被围困的人中有鲁国上卿大夫臧纥、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和臧纥的弟弟臧蒧、臧賈。因臧纥的职位最高，鲁国派出军队想要救出臧纥。鲁国救援的军队从现今泰安东部一个叫阳关的地方出击，但到了接近防邑的地方却不敢前进了。

这时，勇敢的叔梁纥挑选了三百名精悍甲兵，在夜色的掩护下，带着臧蒧、臧賈，一起保护着臧纥突围而出，将臧纥安全送到了鲁军的防地旅松。突出重围救出上卿大夫臧纥，原本可以戴功撤退了，可叔梁纥不走，他不能让自己的土地落入敌人之手，竟转身杀人重围，固守防邑，与如狼似虎的齐军公然对峙。慑于叔梁纥的勇猛果敢，久攻不下的齐军只好撤退。

当年的防城故城，即今临沂市兰山区方城镇古城里村，位于方城镇驻地北两公里处，距区政府约50公里，古城墙呈不规则椭圆形。该



郯城望海楼

地东临方城河，西临诸诸河，北靠蒙山东段余脉，地势开阔平坦。再加之村西有一华泉，水资源丰富，可谓山清水秀。该城址，是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、龙山文化、岳石文化及东周、汉时期的文化遗存，是不可多得的重要古文化遗址。

古城里村历史悠久，早在四五千年前，这里就留有人类活动的痕迹。现村内仍有史前时期遗址一处，高约2米至3米，面积约8万平方米。据考察其上限约在大汶口文化晚期，下限为岳石文化时期。此地大量出土龙山文化新石器时代的遗物。

如今，古城里村已是普通鲁南村庄模样，平房纵横，百姓安居乐业。当年，村址上曾有一座城市，于公元前665年筑城，史称防邑。防邑是鲁国的东疆重镇。据《春秋·隐公九年》载：“公会齐侯于防。”

古城里依山傍水适合居民聚集，西汉至晋代，古城里村为华县县治，曾做过临沂旧治。据新旧各种志书资料记载，截至目前，古临沂治所尚有三种不同说法：一说在诸葛城（今临沂白沙埠乡内）；二说在临沂庄（今兰山区汪沟乡内）；三说在古城里（今兰山区方城镇内）。

清乾隆二十五年《沂州府志》卷七《古迹》载：“临沂城，县北五十里，今临沂社是也。”同书“乡社”目，有“孝感乡”“临沂社”的记载，说明今临沂市北确实有临沂社。

前几年在古城里村发现一块古石碑，上刻“临沂”二字，不见时间和书丹者名字。询村中老人，称原在古城里东门上首，明清时就有，后门拆碑存，今仍立于村东门外。这更是此地曾属古临沂的证据。

古城里村西北有一眼华泉，历史悠久。据光绪《费县志》记载：“华泉在古华城北，一名‘养正泉’，绕至城东，多生蒲苇，南流入防城河。”又据《汉书地理志详释》载，古城

里村北有泉，因“平泽中泉眼百余似华也而名华泉”。

古城里村人杰地灵，曾一度传为颜回孝悌里之地。有史可考的是，这里曾经是三国时期曹操手下著名大将臧霸的故地。臧霸，字宣高，曾任琅琊相，类同临沂地区行政长官第一把手，他为人正直义气。

## 登东山而小鲁

孔子为叔梁纥六十多岁所生，从小就超凡。在青年时期，孔子于鲁国担任过管理仓库及畜牧的小官，后因其博学多闻、修书习礼而聚众讲学。凡带上一片“束修”的，孔子都将其收为学生，如颜路、曾点、子路、子贡、颜渊等，这些是孔子较早的一批弟子。

孔子创设私学，打破了“学在官府”，并且进一步促进了文化下移之风。昭公二十五年（前517年），鲁国内乱，孔子离开鲁国前往齐国。孔子在齐国深受齐景公的赏识和厚待，并且时常问政于孔子。但受奸人所害，孔子在齐国终不得志，遂又返鲁。

鲁定公六年（公元前504年），季氏的家臣擅权。孔子不满这种“政不在君而在大夫”“陪臣执国命”的状况，不愿出仕。退隐而修著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，众多弟子跟着孔子走遍各国，跟随他学习。

鲁定公九年阳货被逐，孔子才见于鲁，被任为中宰，是年孔子五十一岁。“行之一年，四方则之”，他由中都宰迁司空，再升为大司寇。齐国担心孔子治理鲁国，而使鲁国比自己强大，于是送女乐到鲁国，季桓子沉迷于女乐不理朝政。孔子感慨难以实现其抱负，遂带领颜回、子路、子贡、冉有等十余弟子，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，经历了长达十几年的颠沛流离之旅。



蒙山上孔子小鲁处石碑

留下了众多的足迹。主要遗址、遗迹有：孔子小鲁碑、望海楼、圣憩石、大通岩、遇圣桥、“子宿”村等。另外，临沂兰山境内孔庙又称“临沂文庙”，是历代祭祀孔子的地方。旧时一直是州学、府学所在地，临沂市区内仅存的一处古建筑，也是鲁东南地区现存唯一一座孔庙。

《临沂县志·礼祀》记载：“孔子庙，在县治西，旧在东南，宋靖康毁于火。金守臣高召卜迁今地，其后再毁再葺。元末兵燹，故址仅存。明洪武二年，知州罗希孟重修。正统年间，知州贺祺再修。弘治间，知州张凤、吴寅，正德年间知州朱衮，相继增修。嘉靖三十五年，东兖道任希祖见庙庑圯坏，呈请拆毁府殿房重建。清乾隆初，知府李希贤、道光十五年知府熊遇霖、光绪九年知府锡恩，重加修缮。”可以看出，宋代开始建庙，金代在此定址，数次被毁，也历经各朝代加以修复完善。

在春秋时期，临沂有一大部分属于鲁国疆土，因此孔子的弟子中一部分属于沂蒙籍。孔子众多沂蒙子弟中比较突出有曾参、仲由、澹台灭明等。曾参（前505年-前436年），字子舆，鲁国南武城（今山东平邑县人），中国古代思想家、教育家。从师孔子，孔子以为能通孝道、故授之业，作《孝经》。曾参回到家乡，便专注于传播儒学，设帐授徒，后被称为宗圣。

仲由（前542年-前480年），字子路，鲁国人，今山东平邑县仲村镇人，“孔子十哲”之一，为人刚直勇力。一生追随孔子，保护孔子，并且积极维护和实践孔子的儒家学说，称“先贤仲子”。

澹台灭明，复姓澹台，名灭明，字子羽，鲁国武城（今属平邑县南武城）人，教育家，孔门七十二贤之一。唐封其为“江伯”、宋封其为“金乡侯”。澹台灭明离开孔子后就南下到达楚国，“从弟子三百人，设去就，名施于诸侯”，也正因此这样，那时候的南昌虽然远离中原，但是从来没有被称为“蛮夷”。

除此之外，孔子弟子还有子游、有若、颛孙师、颜渊、闵子骞、冉伯牛、仲弓、宰我、子贡、冉有、季路、子夏等，均生于沂蒙地区。孔子及其弟子在沂蒙地区传播儒学思想，并对沂蒙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
## 传道授业多徒弟

据《韩诗外传》载，孔子于邾邾程本子，“倾盖而语终日，甚悦”。随即，他叫来子路说：“由来，取束帛以赠先生。”子路曰：“昔者由也闻之与夫子，士不中道相见，女无媒而嫁者，君子不行也。”孔子曰：“《诗》云：‘有美一人，清扬婉兮。邂逅相遇，适我愿兮。’且夫程本子，天下之贤士也，吾于是而赠。”孔子爱贤举才，遇贤士则促膝而谈。

据清乾隆年间修《郯城县志》记载，孔子曾到郯东部的马陵山上登高望海，后人称此地为“望海楼”。孔子“问官”之后，曾感慨地说：“吾闻之，‘天子失官，学在四夷’，犹信。”孔子将鲁文化的种子传播至此，对齐鲁大地的文化融合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。

孔子在几十年的漫游过程中，为沂蒙大地

## ■ 名流影像

1905年4月30日，胶济铁路全线通车第二年，清政府道员黄中慧乘火车途经高密时，被德国站长奥力虚疑为日本侦探，

强行拽下火车，交由士兵看管，由此引发一场反对德国种族歧视的轩然大波。

## 清末胶济铁路“黄中慧风波”

□ 于建勇

说起黄中慧，鲜为人知。《人民日报》原高级编辑、传记作家《在历史现场》一书作者李辉说：“不清楚黄中慧为何人，在几种不同的民国辞典中均未查到他的条目。”

但有一副挽李大钊的对联：“求仁得仁公应无憾，以暴易暴吾谁与归。”就是黄中慧所写。可见，黄中慧并非无名之辈。

笔者多方查阅史料得知：黄中慧，字秀伯，江苏江宁人（今南京人），曾赴美留学，以道员分直隶，清末随伍廷芳出使美国，任首席参赞。其父黄慎之（名思永），光绪年间状元，实业家，与张謇被时人称为“商部实业两状元”。

尽管黄中慧不是特别有名，但因在胶济铁路的一次乘车遭遇，一时成了报纸上的主角。

1905年4月30日，黄中慧乘火车赴青岛。那一年，是胶济铁路全线通车的第二年。通车初期，只有1列客车在青岛—济南之间往返运行。1908年9月，又加开1列快速客车，只在大站停车，所以那时能够乘火车的人很少。

这本该是一次非常愉快的旅行。因为黄中慧乘坐的是一等车，这不是一般人所能享用的。

王斌著作的《近代铁路技术向中国的转移》一书中写道：“一等车非常舒适，座位有软垫和方便的靠背，座位前边间距很大，单个的隔间可关闭。车厢两端各有一间可关闭的小室，一间是供车辆看守人休息和取暖用的，另一间是观景隔

间。观景隔间是客厅，内有沙发、桌子和几把把沙发椅，过道旁边有两个睡觉的隔间，内有床和厕所。夜间有煤油灯照明。”

当时一等车为欧洲人专享。黄中慧在一群欧洲人中自然十分显眼，尽管他穿着洋装，但亚洲人面孔是改变不了的。列车行至高密站，黄中慧就被一个叫奥力虚的德国站长给“揪”了出来。

站长何以管得这么宽？现在有人有所不知，当时站长地位很高，山东巡抚还授予站长和列车长以相应的中国官阶。官阶从五品至九品不等。相当于现在在现在中国市级正副职到乡科级正副职。礼部也批准将他们正式编入朝廷官员中。

“铁路上的中国职员在民众中享有较高的声望。曾有一位朝廷将军由于拒绝出示车票而被铁路中国职员请下了车。”连中国职员都这么牛，更不必说德国站长了。

高密站属于大站，停车时间约15分钟—20分钟。奥力虚站长到一等车送客，在一群白人中发现了一个黄色人种——黄中慧。

站长虽然眼神很好，但判断力不佳，错把黄中慧当成日本侦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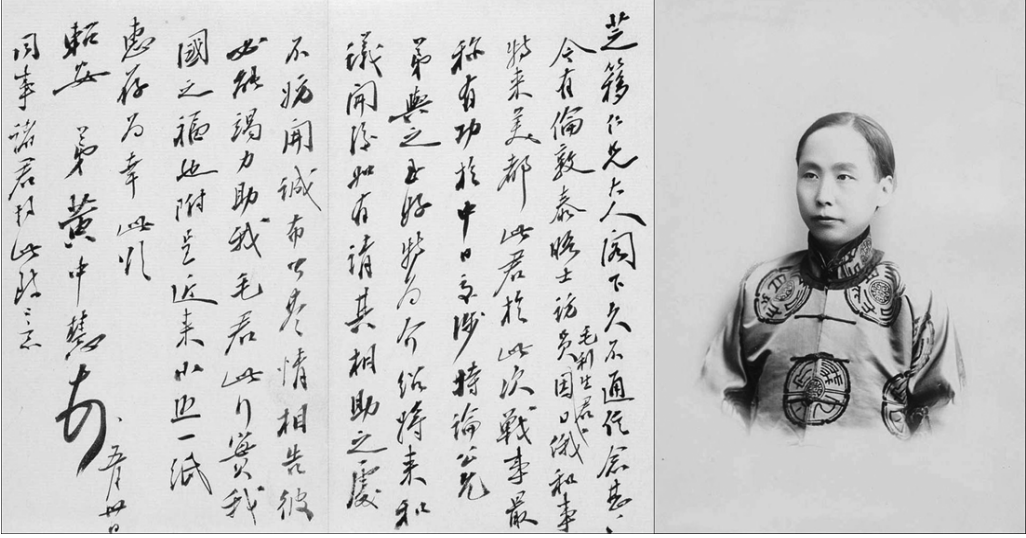
德国人对日本人警惕性很高。当时日本一直图谋取代德国在山东的特殊地位。早在1897年“胶州湾事件”发生时，就意欲干涉，以报“三国干涉还辽”之仇（俄、德、法三国为了自身利益，迫使日本把甲午战争后割让的辽东半岛归还中国）。

黄中慧被当成日本侦探，成为德日交恶的受害者。这时有三名德国军官和律师偕家眷，持一等车票上车。奥力虚命令黄中慧把座位让给德国人。看来那时也不是对号入座。

黄中慧操英语据理争辩，毫不相让，结果被拽下车。更让黄中慧生气的是，站长还把他交给士兵看管，以防这名“日本侦探”跑了。

1905年5月28日出版的德文报纸《青岛新闻》则称，黄中慧被逐出的理由是因为他“占用了过多的空间”。德国学者碧能艳在其著作《德国在山东的殖民地青岛，1897—1914》中采纳了这一说法。

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廿八日（1905年5月31日）出版的《申报》，以《详记黄观察被火车站长殴辱事》为题作了报道。观察，是清代对道员的尊称。报道说：“同车之人告以此系中国监司大员，乌得如此虐待。站长闻之，爽然若失，因请观察上车。”



黄中慧肖像及1905年7月2日致周自齐的信

但黄中慧并不想就此罢休，他在高密不走了。这对高密站长来说，无疑是个“烫手的山芋”，遂好生款待，多方周旋。铁路公司总办锡乐巴闻此也电告该站长需优礼相待。

锡乐巴（1855年—1925年），德国铁路设计师，胶济铁路主要设计者，也是胶济铁路首任负责人。

等黄中慧到青岛后，锡乐巴又亲自到他住住的行馆慰问，也是为了浇灭他的心头之火。本来，有了这番“心理按摩”，黄中慧的火气可能也就消了，可没想到锡乐巴的一封信道歉信，让黄中慧再次火起。

信中写道：“黄道台阁下敬启者，前闻阁下于上月三十号在密车站所遇不便之事，由于敝公司站长奥力虚失职太过，敝总办等闻之，抱歉殊深，当将此案详慎调查……并议定将奥力虚高密站长之职立行撤差……”

尽职太过？这是批评站长呢，还是表扬站长？是道歉呢，还是辩解？

黄中慧大为不满，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回信，信中说：

以无辜搭客，毫无过失，而无端逐出车外，用强力驱迫，并交兵丁看守，夺其自由之权，乃贵公司挪易其词，仅名之为不便之事？而转自谓其所用之人为尽职太过？虐待过客至于此，极而如此措辞，未免过于失当。以此等举动施之官长，乃仅称之为不便，则寻常客商又将若何患处耶？由此类推，可见贵公司虐待华人已视为成例。”

黄中慧推断的“虐待”或许言过其实，不过“歧视”倒是客观存在。

德国人是这样划分客车等级的：一等为欧洲人专享；二等为欧洲人和上等中国人乘坐；三等则为普通中国人乘坐。这种按人种划分等级的做法，带有明显的种族歧视。

德国学者余凯思指出：“胶澳殖民地时期，进化论和生物学的种族话语在德国广为流行，成为德国人论述中国的主导因素。”“‘中国人’是被当作‘人种低级’和‘价值低下’来看待的。”

黄中慧是一位有影响的改革派人物。他还是北京最早的白话报《京话报》（1901年9月8日创刊）的主编，与其他中文、日文及英文报纸有密切联系，于是上海和青岛报纸都登载了

这一新闻。这起事件正值中国收回利权运动时期，在当时激起了反德情绪。

中国报纸还将此事与高密和胶州撤兵联系起来。其背景是：1900年，因筑路冲突，胶澳总督叶世克向高密和胶州各派了200人的军队，保护胶州—高密段铁路建设，可直到铁路建成都没有撤出。黄中慧事件发生时，德军依然在此驻扎，直到同年11月才撤出。

报上称，中国人不再处于德国占领时的那种卑躬屈膝的地位了，所谓的“黄种人”获得了自信，不能再由外国人做主——特别是在铁路问题上。

当时德国驻华公使穆默表达了对此事的不满：“中国人中流行的这种情绪很典型，每一件微不足道的、以前都不会引起注意的事件，现在都被夸大成了不寻常的事情，并对外国尤其是德国进行漫无边际的攻击。”

后来，座位歧视这种状况有所改变。1907年，山东巡抚杨士骧访问青岛时，就乘坐了包括豪华车在内的多列，费用高达3000元，当然这笔钱由山东巡抚衙门负担。毕竟，挣钱还是最主要的。

再说黄中慧。《在历史现场》作者李辉在澳大利亚查看莫理循档案时，看到黄中慧为莫理循访美写给“芝蔴（y i）仁兄”的引荐信。

黄中慧与莫理循是好友。莫理循（1862年—1920年），1897年—1912年任《泰晤士报》驻华首席记者，1912年—1920年任中华民国总统政治顾问，是一位与近代中国关系密切的旅行家及政治家。

黄中慧在信中称：“芝蔴仁兄大人阁下，久不通音，念甚。今有伦敦泰晤士报访员毛利生君（即莫理循），因日俄和事特来美都。此君于此次战事最称有功，于中日交涉持论公允，弟与之至好，特为介绍。将来议开后，如有请其相助之处，不妨开诚布公、尽情相告，彼必竭力助我。夫君此行，实我国之福也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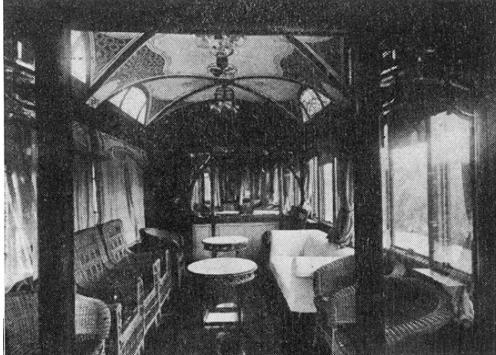
可见，黄中慧与“芝蔴”关系也不错。可“芝蔴”是谁？芝蔴乃周自齐早期别号。

周自齐（1869年—1923年），单县人，时在华盛顿清驻美公使馆任二等参赞，后回国创办清华学堂（清华大学前身）。1912年出任山东都督，1922年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兼教育总长，还短期代行过民国大总统职务。

周自齐与山东很有缘，黄中慧与山东也很有缘。在《详记黄观察被火车站长殴辱事》报道中有这样一句话：“（黄中慧）送夫人往山东归宁。”归宁，古时礼俗，夫妻携礼回娘家方家省亲。由此推断，黄中慧是山东女婿。

黄中慧在给周自齐的信未附言：“附呈近照一纸，惠存为幸！此颂韶安。弟黄中慧顿首。五月卅日。同事诸君，特此致意。”

这封信写于1905年7月2日，正是“黄中慧风波”两个月后。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关于黄中慧的珍贵文献。



胶济铁路的贵宾车